



醴陵陶瓷博物馆。章云云 摄



深江书院。图片来自“今日醴陵”微信公众号

# 渌水悠悠连八闽：醴陵与福建的千年交响

石建平

## 株洲文脉

地处湘东要地、湘赣之边的醴陵，是一座在时光中淬炼出独特气质的城市。它有着两千多年的建城史，北接长沙，南下湘南，西进湘中，东联赣南，地理上的枢纽位置注定了它在历史风云中的不凡。

40多年前，当我还在湖南师大求学时，便曾踏上湘东醴陵的土地，考察这里的陶瓷与花炮产业，在罗霄山脉与渌水湘江交织的“甘泉为醴，群山为陵”的山水格局中流连忘返。2025年11月，循着湘赣文化渊源的历史脉络，我再次回到这座富有底蕴与神秘感的城市。站在高耸的醴陵门下，历史的云烟在眼前悠然而过。宋代以前，湘赣部分地区曾被视为“蛮荒之地”，但在宋代之后，一场以理学为核心、以书院为标志的文化大幕徐徐拉开，紧随其后的陶瓷文化与红色文化，更是将湘赣两地紧紧缠绕。而醴陵，正是这场跨越千山万水的文化交流中，最忠实的见证者与演绎者。

### 渌水悠悠知音：书院里的理学奇缘

提起中国理学史上的盛事，发生在八百多年前的“朱张会讲”无疑是一座巍峨的丰碑。人们熟知这场历时两个多月的学术争鸣主要发生在长沙的岳麓书院与城南书院，却鲜少有人知道，这场开创中国理学交流先河的伟大相聚，其实肇始于醴陵的深江书院，最终又分袂于株洲的湘江之畔。

促成这段旷世情缘的关键人物，是时任漳州知州、湖南安抚使的福建崇安人刘珙。刘珙是朱熹之父刘子羽的长子，当年刘子羽受挚友朱松临终托孤，悉心抚育朱熹成长。刘珙主政漳州时，不仅重修了因战乱荒废三十多年的岳麓书院，更为活跃学术氛围，有意促成了“朱张会讲”。

公元1167年8月，朱熹从福建武夷山出发，跋山涉水经江西抵达醴陵。而张栻则从长沙专程赴醴陵迎接，两位旷世大儒在如今深江书院的前身——府衙青山山麓理学宫，完成了历史性的汇合。走进今日的深江书院，书斋前的空地上仍矗立着朱熹与张栻席地而坐、谈学论道的雕像，仿佛还在诉说着那段风雅岁月。当年，他们在此住了几日，观赏古城风貌，并针对儒学经典《中庸》中的“中和”学说展开了热烈探讨。据朱熹随行弟子范念德记载，两人“论《中庸》之义，三日不能舍”。几日的切磋后，他们才移步长沙继续讲学。

深江书院的文脉传承，亦处处闪烁着福建贤达的身影。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醴陵官府便在朱熹设坛讲学处建朱子祠，立朱子石像以作纪念。绍兴五年(1134年)，近古稀之年的朱熹出任漳州知州、荆湖南路安抚使，应醴陵籍弟子吴猎、蔡贲之邀重返醴陵讲学。看到昔日学宫略显荒凉，又见西山清兴寺风光旖旎，他提议将学宫迁至西山，形成“寺学一体”的格局。朱熹的这个心愿，在六百多年后由另一位福建人完成了。清道光九年(1829年)，福建长乐人陈心炳出任醴陵知县。他崇文兴教，以原书院年久失修、势欲倾颓，需借为办公场所为由，果断写下《修建深江书院记》，将已更名为深江书院的学宫正式迁至城郊西山清兴寺旁，为醴陵学子开辟了一方绝佳的研学净土。

醴陵与福建的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了无数佳话。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年)，福建莆田籍豪放派诗人刘克庄游历醴陵，在《醴陵客店》中留下了“市上腥膻皆楚语，桥边碧色是湘流。直南乡国三千里，目断羁魂起暮愁”的千古乡愁。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福建连城人赖超序任醴陵知县，他痛惜学宫毁于明末战乱，极力募资修复，后被朝廷封为“文林郎”。他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主持湖南乡试时，更是公道正派，为国家发掘了大批人才。

清代道光年间，在宗棠受聘担任深江书院山长的同时，他将《朱子小学八则》中的核心教义与“传道授业解惑”相融，大兴经世致用之风，增设舆地、兵法、农事等实用课程，甚至带领学生监管西山生态、守护山林，开创了书院教育的创新之举。后来，左宗棠在担任闽浙总督、与沈葆楨接力创办福建船政时，仍以深江书院的办学理念推动福州正谊书局的建设；在任陕甘总督时，更专门致函招募深江书院学子赴陕甘辅佐政务。

缘分奇妙的足，这场始于醴陵的理学盛会，最终也落幕于株洲。乾道三年(1167年)十一月，朱熹二人同游南岳衡山后，在株洲的湘江边挥手告别。元代人为了纪念此事，在建宁港边建起了“朱张分袂亭”，至今仍是芦淞区的重要文化地标。

### 窑火映丹心：两大瓷都的匠心共振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在近代三大瓷都(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福建德化)中，湘赣两省便占得两席。两大瓷都不仅各自辉煌，更在历史的窑火中实现了深刻的技艺交融与贸易联动。

醴陵自汉代便开始烧制瓷器，至清雍正七年(1729年)实现从粗瓷向细瓷的华丽转身，并在清雍正年间以小汾山寺为中心，形成了“窑群漫山，炉火冲天”的庞大瓷业基地。作为湘东门户，醴陵周边有岳州窑、长沙窑，东有景德镇，且本地瓷土丰富、松木繁茂，占据了得天独厚的优势。近代以来，在熊希龄与文俊铎两位具有实业报国志向的同乡举人推动下，醴陵瓷业攀上巅峰。1905年，熊希龄在醴陵创办湖南瓷业学堂，开中国近现代陶

瓷教育之先河，并成功研发出玛瑙红、海碧、草绿、艳黑、褐色五种原料，创烧出独步天下的釉下五彩瓷。这朵陶瓷界的瑰宝，在国际博览会上包揽金奖，被誉为“东方陶瓷艺术的高峰”。

而在东海之滨，福建德化凭借极佳的高岭土资源和丰富的竹木薪炭，烧制出洁白如玉、温润高雅的白瓷，这种被欧洲贵族痴迷地称为“中国白”的瓷器，自宋代起便借助泉州港的便利，沿着海上丝绸之路销往全球，为德化赢得了“世界瓷都”的美誉。

翻开《中国陶瓷史》，从东汉至唐代，岳州窑便与福建早期龙窑共享了龙窑施釉技术。1905年，熊希龄起草的《湖南瓷业学堂章程》中明确记载，曾派人赴闽考察德化窑，学习其胎釉配方与窑型结构。考古发掘更是提供了铁证：醴陵出土的窑址中，发现了与德化极其相似的匣钵和支钉；而《德化窑考古发掘报告》中也提到，德化窑址出土了清末釉下五彩残片，其工艺与醴陵窑如出一辙。

这两大名瓷不仅在技艺上互相辅成，更在汪洋大海上同舟共济。乾隆版《醴陵县志》记载，醴陵瓷器经湘江入湘江，转赣江、闽江抵达泉州港，与德化瓷拼箱出海。在明清时期多艘海上丝绸之路沉船出水文物中，人们不仅看到大量德化陶瓷，也发现了醴陵粗瓷与青花瓷的残片。1915年醴陵釉下五彩荣获巴拿马金奖后，更是通过厦门、泉州口岸大量外销，形成了稳定的国际贸易通道。

### 将星耀长空：红土地上的革命交响

湖南与福建，同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发源地。在这片热土上，红色的火种曾为惊人的默契燎原。作为著名的革命老区、“将军县”，醴陵的红色基因与福建苏区有着血脉于水的深刻羁绊。

两地同为毛泽东同志开展中国社会农民运动调研的重要考察地。1927年初，青年毛泽东在醴陵驻留了一周多，深入先农坛、东富寺，后又到浏口区伏波庙等地，与群众面对面座谈。醴陵的调研材料加上湖南其他四县的走访，最终汇成了震古烁今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文献深刻论述了土地改革的基本任务，为中国共产党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而在此后的1933年11月，时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又在福建第一模范乡——上杭才溪乡进行了十多天的调研，写下了1.2万字的《才溪乡调查》，树立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光辉典范。

在苏维埃政权的探索上，两地也走在了全国最前列。毛泽东曾盛赞醴陵农民运动“好得很”。在秋收起义部队攻占醴陵县城的推动下，1928年1月，醴陵南区工农苏维埃政府在马恋垅陈家洲正式成立。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第一个乡级苏维埃政权，开创了湖南苏维埃组织的先河。同年8月，福建建立的永定溪南区苏维埃政府，则是福建第一个区级苏维埃政权，开创了闽西苏维埃政权的先河。溪南颁布的《土地法》比《井冈山土地法》还早4个月，闽西革命家邓子恢探索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田原则，更是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并予以推广。醴陵南区与福建永定、溪南区等地一道，成为了全国最早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地区，为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战火纷飞的时代，醴陵与福建籍的将帅们更是携手带出了一支支红色铁军。醴陵籍的红军将领左权、宋时轮、耿飈、蔡中照、李谦等，都在闽西苏区留下了战功的足迹。左权1930年回国后，曾任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副校长兼教育长，后任红十二军军长，参与攻打龙岩城、漳州城。宋时轮也参与了创建闽西苏区及多场攻坚战。最为令人津津乐道的，是醴陵籍名将耿飈与福建长汀籍政委杨成武的“神仙组合”。耿飈在闽西担任红一军团红四团团长时，与政委杨成武带领这支具有光荣传统的部队打下了无数硬仗。长征前夕，他们在连城河口温塘战斗中取得大捷；长征途中，这对湘闽双子星更是带领红四团血战湘江、强渡湘江，携手并肩，直到遵义会议后才依依惜别……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但文化的江河却奔流不息。从深江书院的古老讲坛，到醴陵窑的绵延五彩，再到罗霄山脉与闽西大地的烽火硝烟，醴陵与福建，这两座相隔千山万水的地理坐标，在历史的长河中完成了无比深情与壮阔的文化交响。这段深厚的历史情缘，至今仍在湘赣大地与八闽大地上，激荡着回响。

(作者系福建省发改委原副主任，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原福建省文化厅党组书记、厅长)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yzhy83@163.com



## 一把醴陵瓷壶 釉藏谭震林一腔湘东情

肖迪强

### 编者按：

昨日(4月24日)，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谭震林同志(1902年4月24日—1983年9月30日)诞辰124周年。谭震林同志湖南攸县人，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曾多次回湘视察调研，心系家乡建设发展，在农业、水利等领域给予大力支持与悉心指导。在此期间，他与醴陵结下了一段不解情缘。醴陵人民感念其情，赠予一把釉下五彩“牵牛花”瓷壶，将先辈的为民情怀永远定格。一把瓷壶，见证岁月，承载乡情。谨以此文追思先辈、缅怀功勋，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谭震林同志。图片来自《谭震林传》



1959年5月21日《新湖南报》关于谭震林同志(左二)来醴陵、攸县、茶陵检查工作的报道。肖迪强 提供



1959年吴寿祺绘制并赠谭震林副总理的“牵牛花”壶。肖迪强 提供

1959年5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谭震林回到湘东视察，醴陵县委将一把釉下五彩“牵牛花”瓷壶赠予他与夫人葛惠敏。这把瓷壶不仅是醴陵釉下五彩工艺的经典之作，更承载着老一辈革命家与醴陵的红色联结，成为湘东陶瓷文化与红色历史交融的珍贵见证。

### 一次视察，牵挂家乡的发展

醴陵、攸县一带历史上旱灾频发，农业生产不稳。为防洪抗旱、灌溉良田、兼顾发电，国家于1958年9月动工修建酒埠江水库。谭震林同志心系家乡民生大计，积极奔走推动立项、协调资金，多次亲临施工现场视察并参与劳动。

1959年5月12日至19日，谭震林同志先后到醴陵、攸县等地视察农业生产与酒埠江水利工程建设。

当时醴陵为全省水稻高产标杆县，他轻车简从深入四汾、清水江公社，实地调研水库坝塘施工与粮食生产情况，详细询问工程进度、建设质量与民工生活，强调要保安全、保民生。在醴陵县委座谈会上，谭震林同志传达中央农业工作指示，部署粮食生产、农业合作化等工作，要求稳定生产秩序，保障粮食供应；认真听取醴陵陶瓷产业与地方经济发展汇报，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出指导意见。视察期间，他始终坚持“干部要与群众同甘共苦”，拒绝特殊接待，与基层干部同吃大灶。

在谭震林同志关心支持下，历经两县人民艰苦奋战，酒埠江水库于次年建成。这座湘东重要水利枢纽，灌溉醴陵、攸县等52万亩农田，兼具发电、防洪等综合效益，是安澜兴利、泽被一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民生工程。

### 一把瓷壶，凝结家乡的敬意

醴陵人民感念其情，赠予一把釉下五彩“牵牛花”瓷壶，将谭震林同志的为民情怀永远定格。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吴寿祺(右一)向学生传授釉下彩艺术创作。肖迪强 提供

这把瓷壶以醴陵特有的高白泥为胎，通体莹白如玉，壶身彩绘牵牛花藤蔓、粉紫与艳红的花瓣错落绽放，翠绿藤蔓蜿蜒舒展，笔触灵动自然，尽显醴陵釉下五彩瓷“温润剔透、素雅内敛”的精髓。

瓷壶器型采用当时“三馆瓷”(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工人体育馆)经典琵琶形，壶身墨书“谭震林、葛惠敏同志惠存，中共醴陵县委敬赠，1959年5月”，底款为“湖南醴陵”蓝色楷书印章款。经醴陵陶瓷界考证，此壶为吴寿祺先生所绘。吴寿祺系清末湖南官立农业学堂毕业生，醴陵釉下五彩瓷烧制技艺复兴者，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主持醴陵陶瓷研究所技艺教学，其笔下花卉兼具工笔细腻与陶艺鲜活，“牵牛花”更是其晚年代表题材。

当年醴陵县委借此壶相赠，既因醴陵陶瓷是地方文化名片，更因多次入选国家用瓷、代表了当时中国陶瓷的较高工艺水准。

### 一抹釉彩，传承醴瓷的匠心

这把牵牛花瓷壶，诞生于醴陵釉下五彩瓷技艺复兴关键时期。1955年9月，醴陵县陶瓷研究所成立，吴寿祺等老艺人重拾失传技艺，培育大批人才，推动醴陵瓷重返中国名瓷行列。

从清末创烧、1915年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赢得“东方陶瓷艺术高峰”美誉；到1956年起成为国家用瓷、国家领导人用瓷、国家礼品瓷，醴陵釉下五彩瓷以“无毒无害、色彩温润、高贵典雅”独树一帜。这把赠予谭震林同志的牵牛花瓷壶，既是醴陵釉下五彩瓷繁荣的见证，更是醴陵陶瓷人坚守匠心、守正创新的生动缩影。

历经半个多世纪风雨，瓷壶釉色依旧鲜亮，一如谭震林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为民初心永不褪色。壶上牵牛花，是匠人笔下的生机，更是革命家与故土人民的情感纽带——它向阳生长、坚韧不拔，恰似先辈对家乡水利、农业、民生的殷殷嘱托，也如醴陵陶瓷人代代坚守匠心，在岁月里扎根绽放、欣欣向荣。

如今，这朵釉下五彩牵牛花，早已成为醴陵红色文化与陶瓷文化交融的鲜明象征。深藏纹彩中的乡情与牵挂，已经在时代长河里，化作家乡人民生生不息、砥砺前行奋进力量！

下列证件  
声明作废

·曾雨明遗失中央  
小镇高层11栋1203房  
的0008501号伟大家庭  
团往来结算统一凭据，  
金额185885元。  
·湖南大虞农业专业  
合作社遗失财务专用  
章及原法人“刘锋”  
的私章各一枚

# 广告 接待 热线 28835396